



Entrance to Low Fertility in China
(1980-2000)

中国步入低生育率 (1980-2000)

巫锡炜 / 著



21 世纪人口学研究系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21 世纪人口学研究系列

中国步入低生育率 (1980-2000)

Entrance to Low Fertility in China
(1980-2000)

巫锡炜 / 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步入低生育率: 1980~2000/巫锡炜著.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2. 12

(21 世纪人口学研究系列)

ISBN 978-7-5097-3910-5

I. ①中… II. ①巫… III. ①生育率-研究-中国-1980~2000
IV. ①C924.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253850 号

· 21 世纪人口学研究系列 ·

中国步入低生育率 (1980~2000)

著 者 / 巫锡炜

出 版 人 / 谢寿光

出 版 者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地 址 / 北京市西城区北三环中路甲 29 号院 3 号楼华龙大厦

邮政编码 / 100029

责任部门 / 社会政法分社 (010) 59367156

责任编辑 / 李玉柱 郑 熾

电子信箱 / shekebu@ssap.cn

责任校对 / 李晨光

项目统筹 / 童根兴 郑 熾

责任印制 / 岳 阳

经 销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市场营销中心 (010) 59367081 59367089

读者服务 / 读者服务中心 (010) 59367028

印 装 / 北京鹏润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 787mm×1092mm 1/16

印 张 / 16.25

版 次 / 2012 年 12 月第 1 版

字 数 / 280 千字

印 次 / 2012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7-5097-3910-5

定 价 / 49.00 元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读者服务中心联系更换

▲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丛书总序

1662年，英国人约翰·格兰特出版专著《关于死亡表的自然的和政治的考察》，标志着现代人口学的诞生。迄今为止，世界人口学的发展历史已有300多年。

1974年，中国人民大学人口研究所创建，是国内创办最早、学术力量最为雄厚、人才培养层次最全的人口与发展领域的专门教学和科研单位。从此以后，国内第一个人口学专业硕士点、国内第一个人口学专业博士点、国内唯一的人口学重点学科点、国内唯一的人口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相继在此诞生。

2011年10月31日，联合国人口基金宣布全世界人口达到70亿。这一天，距1999年的“60亿人口日”不过12年。

2010年11月1日，中国第六次人口普查揭示中国总人口超过13.7亿。相比较1953年7月1日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次人口普查结果6亿，在这块960万平方公里的版图上，人口数量已经翻了一番还要多。

人类生活在愈来愈拥挤的地球上，人口的数量、素质、结构、分布由不断出生、死亡和迁移流动着的人群所决定，这也改变着人们的生存环境和生活状态。

以人类人口作为研究对象的人口学尽管发展了300多年，依然疑惑着人类的发展空间、好奇着人口的变化因果、争论着人类与环境的关系、探索着人口未来的走向。也许，正如对人类的终极考问“你是谁？”“来自何方？”“去向何处？”一样，生命不息，对于人、人群及生活于其中的社会的探索就会没有止境。

在人口形势和人口问题上，全世界各个国家既有共同语言，又各怀难言之隐。“婴儿潮”的一代人刚刚淡出视野，“低生育率”的焦虑又跃上心头；正无奈于失业率的居高不下，劳动力短缺的号角却已吹响；更不用说“银发浪潮”

铺天盖地，国际移民四处奔走。“生存还是死亡？”在人类文明如此发达的今天似乎早已不是问题，但如何提升生命素质、提高生活质量却是一个没有终点的追求。

作为世界第一人口大国，中国的人口转变遵循了世界的一般规律，人口再生产类型从高出生率、高死亡率、低自然增长率的传统模式已转为低出生率、低死亡率和低自然增长率的现代模式。然而，庞大的人口基数、迅速的转变过程、独特的中国国情也带来了非同一般的人口现实和无先例可循的人口问题。

21 世纪，一个新的起点。对于人口的过去和未来，我们充满好奇和探索精神。正如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院长、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翟振武教授所指出的：“在中国这样一个人口大国中，地域差距极大，人口状况千差万别，人口问题更是复杂多样。实践呼唤理论，实践呼唤人口科学的发展。正是这种复杂的人口国情，为中国人口科学的发展提供了得天独厚的土壤。因此，中国的人口学没有理由不出经典巨著，没有理由不出大师级人物，没有理由不站在国际人口学学术前沿。”

受此鼓舞和启发，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人口学系人口学教研室酝酿策划了这套丛书，希望用我们的眼光和视角关注 21 世纪的人口学，用我们的智慧为人口学研究添砖加瓦。在此要特别感谢教研室的各位同仁：人口学系系主任段成荣教授、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刘爽教授、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人口学博士暨中国人民大学人口学博士陈卫教授、美国布朗大学社会学博士杨菊华教授和北京大学社会学博士巫锡炜讲师。特别感谢中国人民大学“985 工程”经费的资助，以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的精心编辑，使这套丛书得以面世。

我们希望，以这套研究丛书为契机，中国的学者站在 21 世纪，纵观人口的过去，展望人类的未来；立足于中国，通过中国的人口现实折射世界的人口形势，以中国的人口经验充实世界人口学的宝库。

人口学教研室主任 宋 健

2012 年 4 月于北京

序

祝贺巫锡炜的博士论文《中国步入低生育率（1980~2000）》正式出版。

作为巫锡炜在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攻读硕士学位和博士学位的指导教师，我非常高兴地看到巫锡炜近年来所取得的一系列的学术成就，并为本书做序。

记得刚认识巫锡炜时，他在社会统计和人口统计方面的基础并不是很强，但是他通过几年来踏踏实实地努力钻研，在学业上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他在学习上非常积极，对教学内容和有关学术文献，从不满足于一般地看懂学会和取得一个好的考试成绩，而是十分善于将学习到的新方法迅速应用到自己的实际研究中去。例如，在硕士研究期间，他努力解决了将生育史数据改造为人年记录数据的处理问题，将泊松回归应用于时期和队列的年龄别生育率计算。在博士研究期间，他在参加一项研究课题时，自学并应用了组基泊松发展模型研究了中国高龄老人残障发展轨迹的类型，从方法应用到研究结论都得到学术界的很高评价。在本书中，读者还可以见到他应用分割总体生存模型对生育间隔的分析。周边的老师和同学公认巫锡炜在技术方法的学习和应用上很有灵气，然而我应该指出，其实巫锡炜并不属于那种仅仅满足于囫圇吞枣地将现有方法搬来就用的研究者，从本书中的研究中可以看出，他对研究题目在的理论基础和方法论视角上的把握很全面、很到位，因而所做研究分析的针对性很强，切入点很准确，所以才能做到言之有物，富于创新，方法应用恰当，结论有较强说服力。

本书系统而深入地研究分析中国的生育转变。应该说，敢于挑战这个争议极大而又非常重要的研究题目，首先要具备很大的勇气。对于巫锡炜这样的年轻学者，这并不是件容易的事。然而，他不仅完成了这个研究，而且做得有声有色。我认为，本书的新颖之处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研究视角上，本书避开了生育研究中关于中国最近几十年生育水平到

底有多高的争论，而是借助全国性调查数据，直接考察 1980～2000 年我国妇女生育率变化的实际过程，并结合经典的生育转变理论和近年来国际上关于低生育研究的大量文献，讨论生育时机推迟和生育数量减少对中国步入低生育起到的作用。国内的生育分析中还很少见到类似的研究成果。

第二，研究设计上，对生育率变化进行了多层次（宏观和微观）、多角度（时期和队列）和多指标（递进生育率、去进度效应生育率、累计生育率等）的分析，得到了很多新的结论性认识。例如，生育时机推迟和生育数量减少与 1980～2000 年我国步入低生育之间存在密切关联，但是，这一过程在孩次结构上存在分化：1 孩生育存在明显的生育推迟，也存在近乎完全的生育补偿，故 1 孩生育率始终保持稳定；2 孩生育也存在明显的生育推迟，但生育补偿是部分性的，故 2 孩生育率在不断下降；3 孩及以上孩次虽有生育推迟，但生育补偿几乎为零，故 3 孩生育率也大幅度降低。这些结论都是具体且生动的，但对于认识中国低生育率现象又是非常重要且具有启发性的。

第三，研究方法上，以分割总体模型来处理育龄妇女总体中未观测到的异质性。社会研究中这种未观测到总体异质性思路的提出非常重要也很有启发，其建模思路的使用在国内外的人口学、社会学研究中非常少见。更重要的是，这种方法的使用，可以看到同一个因素对是否生育 2 孩（反映生育数量方面）与何时生育 2 孩（反映生育时机方面）可能具有不同的影响，这有助于深化对妇女生育行为背后微观机制的认识。

第四，数据使用上，考虑到所使用的是调查数据，通常样本规模都并不太大，这对于生育率分析尤其是队列角度的生育率分析而言是一个不足。为此，本书将同一起来源多个年份重复的横截面调查数据加以合并，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数据上的不足；同时对合并之后的数据进行敏感性分析，以确认数据合并的合理性。此外，对回顾性调查数据中生育史信息的深入挖掘使得进行队列生育分析具备了可能。总之，这样的数据使用方式在国内同领域的研究中为数不多，为国内同行利用多个重复的横截面调查数据对人口和社会现象进行趋势研究提供了可参考的例子。

当然，所有的研究成果都是阶段性的，本书也不例外，生育率研究还需要继续推进和发展。例如，本书对对生育推迟之后的补偿或放弃的分析还有待进一步深入，另外本书在对分析结果的概括和理论抽象方面也有待加强，以便推进我们

对中国低生育率更深层次的理论认识。此外，本书介绍了去进度效应总和生育率方法，概要地总结了与此方法有关的学术争论和重要文献，并且应用这一方法分析了中国的生育率转变。我想补充一个新信息，在巫锡炜这本专著编辑出版之际，国际学术界在去进度效应生育率的研究方面又取得了十分重要的新进展。Bongaarts 和 Sobotka 新近对去进度效应生育率方法做了改进，克服了老指标的内在缺陷，提出了一种结果更为稳定的进度与孩次调整的总和生育率指标（tempo-and parity-adjusted total fertility rate）^①。作为应用实例，这两位人口学家还以此新的调整指标研究和分析了前一段时期欧洲国家总和生育率的回升现象，证明其主要原因其实是生育推迟时期效应的弱化甚至消失。这些新的学术成果无论是在学理上还是在经验研究结果上都对中国的低生育率研究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长江后浪推前浪，我很高兴地看到越来越多的年轻学者正在努力将理论和实践结合起来，将定性方法与定量方法结合起来，将宏观分析与微观分析结合起来，不断推出优异的研究成果，不断推进和丰富对中国社会发展和人口变化的认识，并成为社会科学方面学术研究的骨干力量。本书就是一位年轻学者为中国人口学研究所增添的一分新贡献。

郭志刚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2012 年 9 月 11 日

① Bongaarts, John and Tomáš Sobotka. 2012. "A demographic explanation for the recent rise in European fertility".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 38 (1): 83 - 120.

目 录

第一章 导论	001
第一节 研究背景	001
第二节 对 1990 年代中国生育水平的争议和重新估计	016
第三节 研究目的、研究内容、研究意义和研究视角	027
第四节 数据来源及其检查	031
第五节 全书结构安排	033
第二章 基本概念与生育转变理论	035
第一节 生育水平测量的基本指标	035
第二节 更替水平生育、低生育水平及其分类	042
第三节 生育转变理论回顾	046
第四节 本章小结	057
第三章 递进生育的分析	058
第一节 引言	058
第二节 年龄递进生育模型	060
第三节 应用年龄递进模型对 1980 ~ 2000 年中国生育水平的分析	068
第四节 本章小结	086
第四章 去进度效应模型的分析	088
第一节 引言	088

第二节	去进度效应模型简介	091
第三节	应用去进度效应模型对中国 1980 ~ 2000 年生育转变的分析	098
第四节	本章小结	115
第五章	队列生育分析	117
第一节	引言	117
第二节	队列分析的基本原理	122
第三节	数据形式的简要说明	128
第四节	应用队列生育分析对中国 1980 ~ 2000 年生育变化的分析	133
第五节	本章小结	152
第六章	生育推迟的微观机制：对 2 孩生育的分析	154
第一节	引言	154
第二节	理论考虑	156
第三节	数据说明、方法简介和模型设定	158
第四节	结果与分析	164
第五节	本章小结	173
第七章	主要结论与讨论	175
第一节	主要结论	175
第二节	可能的贡献与不足	177
第三节	若干研究议题	179
参考文献		181
中文文献		181
英文文献		193
附 录		212
附录 1	中国历年总和生育率：1949 ~ 2006	212

附录 2 中国历年自然增长率和出生率：1990 ~ 2004 213

附录 3 中国与世界主要国家或地区总和生育率：1980 ~ 2008 213

附录 4 合并数据所得结果与其他来源结果的比较：敏感性分析 215

附录 5 年龄别生育亏损或盈余：全孩次，1946 ~ 1950
 队列为参照 216

附录 6 年龄别生育亏损或盈余：孩次 1，1946 ~ 1950
 队列为参照 217

附录 7 年龄别生育亏损或盈余：孩次 2，1946 ~ 1950
 队列为参照 218

附录 8 年龄别生育亏损或盈余：多孩，1946 ~ 1950
 队列为参照 219

附录 9 1997 年全国人口与生殖健康抽样调查个人问卷 220

附录 10 2001 年全国人口与生殖健康抽样调查个人问卷 236

第一章

导 论

由于人口过快增长对经济发展产生了很大压力，中国自 1970 年代初便开始实施以“晚、稀、少”为内容的计划生育政策。随着这一政策得以全面且有效地实施，中国的生育水平从 1970 年代初就出现了大幅度的下降，经历了 1980 年代长达 10 年的波动徘徊以后，时期总和生育率从 1990 年代初开始下降到更替水平以下。1990 年代以来的历次生育率专项抽样调查、历次人口变动抽样调查、1995 年 1% 全国人口抽样调查，以及第五人口普查、2005 年全国 1% 人口抽样调查都一再揭示了这一显著的生育转变（fertility transition）过程。

虽然不同年份得到的生育统计数据一再表明，中国的生育水平在 21 世纪初已经下降到了很低的水平，人口学研究者和政府官员也都接受中国进入低生育水平的事实，但是在有关 1990 年代中国生育水平下降的幅度和速度的认识上，还存在前所未有的分歧和争议。本书拟对 1980 ~ 2000 年中国生育水平下降的过程进行研究，试图对 1990 年代历年总和生育率为何一直处在 1.5 左右的很低水平给出一个人口学解释。

第一节 研究背景

和发达国家的情形不同，政策因素被认为在中国的生育转变中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顾宝昌，1987；彭希哲、黄娟，1993；孙文生、靳光华，1994；林富

德、刘金塘, 1998; 王金营等, 2005; 陈卫, 2005; 蔡泳, 2009; Poston & Gu, 1987; Poston, 2000)。因此, 这里有必要对 1970 年代初期以来的生育趋势以及计划生育政策做一个简要的回顾。

一 1970 年代以来的生育趋势

总和生育率 (Total Fertility Rate, TFR) 是衡量一国或地区生育水平最常用的指标, 表示某一年份中按照当年的年龄别生育率度过整个育龄期的一群育龄妇女的人均生育子女数, 第二章中对该指标进行了较为详细的介绍。图 1-1 给出了中国 1940 ~ 2006 年历年总和生育率的变动趋势^①。图中显示, 在 1970 年代, 中国生育水平出现了大幅度下降^②, 总和生育率从 1970 年的 5.81 降到了 1979 年的 2.75 (参见附录 1), 10 年之内下降了大约 53% [具体为 $(2.75 - 5.8) / 5.81 = 0.527$]。

历经 1970 年代长达 10 年的大幅度下降之后, 中国的生育水平到 1980 年代初时已经几乎接近更替水平^③。实际上, 正如 Ansley Coale 和陈胜利所指出的, 如果生育率保持 1970 年代那样的下降速度, 那么, 中国的生育水平有可能在 1980 年代就下降到更替水平^④以下 (Coale & Chen, 1987)。不过, 与理论上期待的结果相反, 中国的时期生育率在 1980 年代出现了在略高于更替水平处的波动徘徊 (Feeney et al., 1989; 姚新武、尹华, 1994), 直到 1990 年代初, 中国的生育率仍处在略高于更替水平 (曾毅, 1995)^⑤。

-
- ① 1959 年附近的大幅减少是因为当时的中国出现了大饥荒 (Kane, 1987; Peng, 1991), 不过, 图 1-1 中也可以清楚地看到, 随后出现了一个补偿性的生育高峰。
- ② 实际上, 从图 1-1 中可以清楚地看到, 中国的生育率从 1960 年代就开始下降了。因此, 有学者认为中国 1970 年代和 1980 年代初出现的生育率下降其实是被加速了, 因为中国政府从 1970 年代开始实施了强大而有效的计划生育政策, 而且这一政策在 1980 年变得更加严格 (Riley, 2004)。
- ③ 1980 年的总和生育率为 2.24, 具体可参见附录 1。
- ④ 对于更替水平的含义, 详见第二章中的相关内容。
- ⑤ 1992 年 9 月至 10 月, 国家人口与计划生育委员会在全国 30 个省、市、自治区组织了“计划生育管理信息系统首次调查”, 该次调查的样本规模为 38.5 万人, 因此被称作“38 万人调查”, 其中育龄妇女为 11.4 万人。本次调查申报的全国 1991 年与 1992 年总和生育率分别为 1.65 和 1.52, 大大低于更替水平 2.1, 因此在国内和国际上都引起了轩然大波。但是, 曾毅 (1995) 的分析表明, 与 1989 ~ 1990 年相比, 1991 ~ 1992 年真实生育水平确实有较大幅度下降, 但下降幅度中有 1/3 是由于初婚年龄上升造成的, 同时还存在非常严重的出生漏报现象。经过消除初婚年龄上升的影响和考虑漏报的情况, 曾毅认为 1991 ~ 1992 年总和生育率大致在 2.1 左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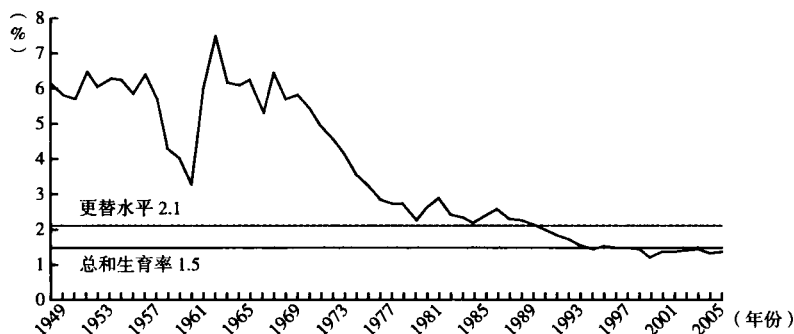


图 1-1 中国的总和生育率：1940 ~ 2006 年

数据来源：1949 ~ 1991 年的总和生育率（TFR）来自中国人口信息网，
<http://www.cpirc.org.cn/en-cpdr/en-file/endata/en-data-13.html>。

1994 ~ 2006 年的总和生育率数据取自相应年份《中国人口统计年鉴》。

1992 年和 1993 年的总和生育率作为作者对数据进行线性插值的结果。

已有研究表明，1980 年代生育变化所呈现的态势有其必然性，这与当时的生育政策和社会经济状态是密切联系的，加之经过 1970 年代的生育水平大幅度下降后，生育水平继续下降的空间比较有限（顾宝昌，1993，1994）。然而，生育水平并没有一直稳定在略高于更替水平的状态。相反，1990 年代开始，中国经历了新一轮的生育水平下降。从官方公布的统计数据来看，粗出生率（Crude Birth Rate, CBR）自 1990 年代初开始持续下降，而自然增长率从 1998 年开始就下降到了 1% 以下的水平并仍呈下降的趋势（见图 1-2 或附录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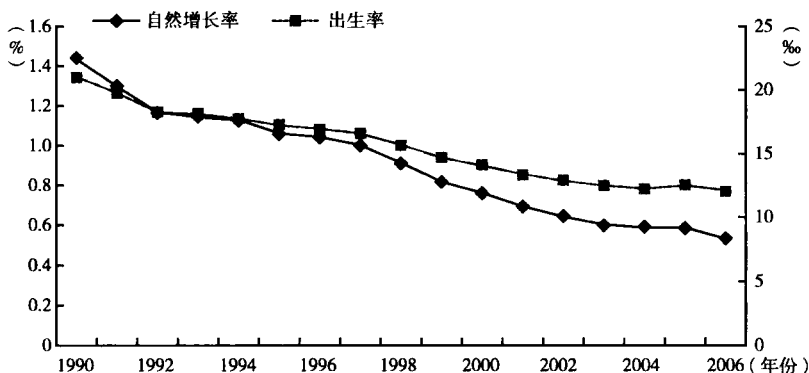


图 1-2 中国的出生率和自然增长率：1990 ~ 2006 年

数据来源：中国人口信息网，<http://www.cpirc.org.cn/en-cpdr/en-file/endata/en-data-13.html>。

值得注意的是,图 1-1 和图 1-2 所呈现的基于年度人口抽样变动调查得到的统计结果实际上已经被向上调整过。所以,虽然国内人口学界和政府对中国 1990 年代以来的真实生育水平到底是多少仍存在着明显分歧和较大争议,但是,各种渠道得到的统计结果乃至国家统计局部门正式公布的统计结果都表明,从 1990 年代初以来,中国的总和生育率已经下降到了更替水平以下,中国进入到低生育水平时代^①。

对于当时的中国而言,生育率出现如此大幅度的下降,确实令世界为之瞩目。生育率如此大幅度下降自然与中国从 1970 年代初开始的强大而有效的计划生育政策具有密不可分的关联。但是,也不能忽视自 1950 年代以来中国的社会经济结构已经发生了深刻变化^②,这种变化弱化了人们的生育意愿,也为 1970 年代的生育下降创造了有利的条件(顾宝昌,1994)^③。

二 1970 年代以来中国生育政策的回顾

一直以来,中国生育政策的内容都被人们简单地描述为“一孩政策”,即要求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实际上,这完全是一种误解。研究表明,中国的生育政策一直都并不缺乏多样性(冯国平、郝林娜,1992; Short & Zhai, 1998; 张纯元,2000; Attane, 2002)。甚至正是出于对中国生育政策具有多样性的考虑,郭志刚等(2003)提出了“政策生育率”的概念,并以其作为量化指标对全国及东、中、西部不同地区的政策生育率情况从不同角度进行分析,以具体反映中国生育政策在地区分布、人口分布和地理分布上的多样性。从时间演化上看,中国的生育政策自 1970 年代初提出以来也并非一成不变,而是经历了起步(即 1971 ~ 1979 年的“晚、稀、少”政策)、收紧(1980 ~ 1984 年的“一胎化”政

① 对于这一点,中国政府已经有过明确的观点。2000 年 3 月 2 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了《加强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稳定生育水平的决定》,指出“稳定低生育水平是今后一个时期重大而艰巨的任务”。2006 年 12 月 17 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关于全面加强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统筹解决人口问题的决定》中,再次指出“稳定低生育水平是新时期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的首要任务,‘十一五’期间是实现这一任务的关键时期”,因此要求“千方百计稳定低生育水平”。

② 比如,社会化和集体化的进程大大削弱了家庭和亲属关系在经济生产、子女抚养和教育,以及个人活动其他方面的传统上的重要性(彭希哲、黄娟,1993)。

③ 实际上,中国后来在 1980 年代的计划生育政策实践经验表明,生育政策本身其实并不能脱离一定的社会条件和一定的工作运行机制的保障。随后将会提到,中国 1980 年代的生育政策在 1970 年代的基础上更加严格,在未顾及可行性的情况下,无视城乡差异的存在而“一刀切”式地实行“一胎化”政策,结果反而使得生育率出现了大幅度的反弹。

策)、调整(1984~1986年的“开小口”政策)和稳定(1986年以来逐步稳定和完善)这样四个阶段(李建新,1996)^①。

1970年代初,新中国成立初生育高峰期出生的人口陆续进入婚育期,宣告了新中国诞生以来第一次生育高峰的到来,人口数量呈现过快增长的趋势,给社会经济发展带来了极大压力。为了降低人口自然增长率,控制人口的过快增长,就需要对与人口再生产有关的婚育时机、婚育间隔乃至生育数量加以限制。为此,中国在1973年确定了以“晚、稀、少”为主要内容,以限制人口增长为主要目的的生育政策;并且进一步对“晚、稀、少”的内涵做出了规定,“晚”是指男性25周岁、女性23岁结婚,“稀”是指两胎之间要间隔3年以上,“少”是指一对夫妇最好生育一个、最多生育两个孩子(汤兆云,2007);另外,规定“除个别地区之外,按照‘晚、稀、少’的要求安排生育计划,一般是可以适应的。有些单位有特殊情况,可在省、市范围内作适当调整。至于大城市人口增长率的计划,今后可以考虑城乡分算。为了使人口出生逐步做到相对平衡,避免长期存在生育高峰,在‘晚、稀、少’的基础上需要做适当调整时,主要是靠做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在群众自觉的基础上来实现”(彭珏云,1997)。这一政策要求明确、口号简洁有力,使得国家宏观的人口计划指标得以具体化,也使得干部和群众对于如何做到计划生育心中有数,便于遵循(彭珏云,1997)。因此,“晚、稀、少”政策提出后,在全国城乡范围内得到全面且有效的执行,从而使得中国的生育率在1970~1979年的短短10年之内以惊人的速度下降了50%以上(Coale & Chen, 1987; 顾宝昌, 1994)。为了进一步严格控制人口增长,推动计划生育工作深入开展,同年9月,中共中央发表了《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提倡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这一公开信是中国生育政策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里程碑^②。至此,1970年代

① 学者们对1970年以来中国生育政策的发展阶段的划分大体上相似(李建新,1996;冯立天、马瀛通、冷眸,1999;张纯元,2000;汤兆云,2008;苏杨、尹德挺、黄匡时,2009),只是对各个阶段所取名称存在一定差别而已。

② 这是中共中央关于推动计划生育的一个极为重要的决策,表明了中共中央对计划生育工作的高度重视。这个文件从理论到实践,用大量的事实和数据阐明了计划生育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对中国计划生育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在国际上也引起了极大的反响。实际上,由国家正式提倡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这在人类历史是空前的(杨子慧,1987)。这也是后来人们将中国计划生育政策归结为“一胎化政策”的由来。

初期提出的以“晚、稀、少”为内容的生育政策最后定位在1980年的“提倡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

1978年12月，具有历史性意义的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中国从此开启了改革开放的新时代，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作为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全力发展国民经济。但是，中国当时面临的基本国情之一就是人口基数大且人口增长速度快，这被国家领导人认为是发展经济和实现现代化的基本障碍^①。为了控制人口增长，实现人口和经济协调发展，国务院在1980年9月召开的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正式宣布实行计划生育政策，指出：“国务院经过认真研究，认为在今后二三十年内，必须在人口问题上要普遍提倡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以便把人口增长率尽快控制住，争取全国总人口在本世纪末不超过十二亿”（杨魁孚、梁济民、张凡，2001）。1981年3月，第五届全国人大第十七次常委会决定设立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与此同时，省、市直到县一级的计划生育委员会也相继设立，形成了全国性的计划生育网络。

《公开信》发表后，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在对生育数量的限制上出现了进一步的收紧。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政策出台后，在城镇通过采取一些必要措施基本上做到了只生育一个孩子，比如，通过党员、团员和各级干部的带头，许多育龄夫妇领取了独生子女证，决心终身只生育一个孩子。但在农村则遇到了重重阻力，广大农民以各种非正常方式尽可能实现自己生育愿望^②，比如“超生游击队”、隐瞒计划外生育，甚至出现与计生干部之间的暴力冲突（Banister, 1987; Greenhalgh, 1994; White, 1994; 查瑞传、徐伟略、翟振武，1999），这些导致农村中党群、干群关系一度变得十分紧张。这种情形不但使得计划生育政策难以执行，而且被认为会有损于政府的合法性（White，

① 当时的国家领导人邓小平在《我国经济建设的历史经验》（1982年5月6日）中曾经指出：“现在我们的国民生产总值按人口平均计算只有250～260美元……但是我国人口多，如果国民生产总值按人口平均每人增加100美元，国民生产总值就要增加1000亿美元。人多有人多的麻烦，很多问题不容易解决。”（邓小平，1983）。他在1983年会见毛里求斯总理贾格纳特时，提到：“中国人口众多，经济比较落后。每年达到就业年龄的娃娃就有七八百万之多，解决这么多人的就业问题是不容易的。”（邓小平，1998）

② 这一时期，农村开始实行各种形式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这在某种意义上刺激了农民的早婚、多育以及偏好男孩的倾向；与此同时，农村基层政权对农民约束力开始减弱（冯立天，1992）。